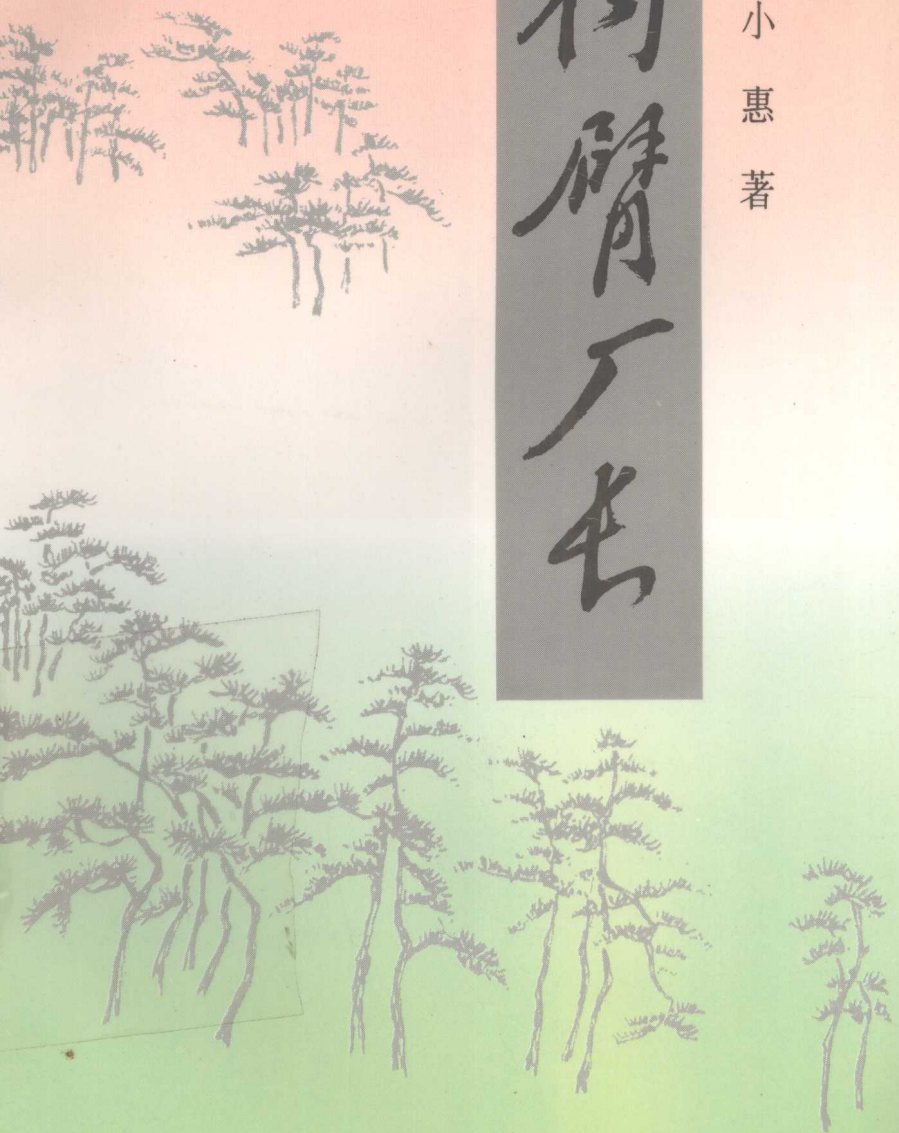


钱小惠 著

独臂厂主



独 臂 厂 长

钱 小 惠 著

西 苑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3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臂厂长/钱小惠著. —北京:西苑出版社,1995.4

ISBN 7-80108-033-5

I. 独… II. 钱…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5910 号

西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北长街甲 1 号 邮政编码:100031)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32 5.25 印张 120 千字

1995 年 5 月北京第一版 1995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5.00 元



钱小惠，安徽芜湖人。1928年生。1941年参加新四军，从事戏剧、美术工作。1948年开始文学创作。解放后，在天津市文化局、华北文联从事文艺工作。1954年为深入生活，调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先后任副厂长、党委副书记等职。1978年调北京市文联，任领导小组成员、文联理事、北京作协常务理事。现为中国作协、北京作协、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北京诗词学会会员。

主要作品有：木刻漫画集《战争与生产》、散文集《死车的复活》、小说《突破》、电影小说《红色的风暴》、传记文学《邓中夏传》（后两部与魏巍同志合著）。此外，与钱瓔同志等整理编辑了烈士遗著《钱毅的书》和阿英遗著《敌后日记》。

序

魏巍

我认识钱小惠同志，大约是在1953年的秋冬时节。

那时我很想到工厂深入生活。一来是我准备在长篇小说《东方》中要写到工人；二来也是一种内心的需要，认为自己当了多年的共产党员，应当从感性上认识自己的阶级。这样，我就在北京郊区跑了石景山钢铁厂和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准备从其中选择一个生活据点。由于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是二七革命运动的发祥地，工厂的负责人黄英夫同志又特别热情，我就在这里蹲下来了。我暂时脱下军衣，换上了一套蓝布工人装，戴上人民铁路的路徽，在机车车间当了一名副支部书记。从此开始了一段新鲜有趣的富有意义的生活。

那时，小惠同志才二十四五岁，他作为华北文联的创作人员也在这里深入生活。我们都住在工厂的招待所里，不久便厮熟了。很快我就了解到，他是老一代文学家阿英同志的儿子，是小小年纪随着父亲参加新四军的。开始搞版画，现在转到文学上来了。他平素不大活跃，话不多，但为人温和热情，尤其工作上非常刻苦。生活上则不大讲究，什么时候见了，都是那身披满灰尘的短大衣，下面是那双又大又粗糙的翻毛牛皮鞋。他就是这样经常出入在烟尘弥漫的翻砂场里，与工人滚在一起。

那时工厂的气氛真好。如果把那时的工厂比作热火朝天的战场，一点也不过分。一到晚间，你听吧，那机器的轰鸣声，那铆枪的哒哒声，那汽锤沉重的噔噔声，加上那电焊不停息的闪光，真有点置身战场的味道。那时工厂的干部，绝大部分都是从工人中提拔的，他们政治觉悟高，懂生产，会管理，尤其与工人情同手足，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效率很高。我认为，建国之初大胆提拔和使用工人干部的做法，是十分正确和英明的。那时的工人在全国居于“老大哥”的地位，心境舒畅，干活儿特别卖力，一股“我不干谁干”的拼命劲头。我们曾亲眼看见一些工人，早出晚归，两头不见太阳，孩子长了好大还不认识爸爸。这确不是虚话。

当时我和小惠，除注意熟悉现实生活和各种人物，还注意了解长辛店初期的工人活动和二七大罢工那段光辉灿烂的历史。那时工厂里还有不少亲身参与过二七斗争的老工友，从他们那里我们听到许多生动的故事和真刀真枪的斗争情景。说实在的，我的心魂确实被这个登上政治舞台不久的伟大的阶级震撼了。不要看他们只是一群被污辱与损害的可怜的奴隶，等到他们一旦觉醒与组织起来，整个的世界就要刮目相看了。在这种激动的心情下，我向小惠建议我们两人合作来写一写这段历史。二七大罢工被镇压的腥风血雨之后，当时北京的一家大报上，曾出现了一则奇怪的启事：征求反映这个历史事件的剧本。然而事情过去三十年了，并没有这样的剧本出现。我就对小惠说：让我们来偿还这笔历史的债务吧。

小惠欣然同意。此后我俩便朝夕相伴，出入于二七老工友的家里。像二七老工人左士俊、刘炳波、李顺和、赵国良，还有二七烈士葛树贵、吴祯的遗属，都成为我们亲近的朋友。

从1954年4月起,我们开始了电影小说《红色的风暴》的写作,至1955年4月完成,1956年7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我可以说,这本书的人物,是以长辛店工人活生生的人物性格为基础,而又赋予二七斗争那一页伟大历史的灵魂完成的。如果没有我们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人物的体验,只凭一些历史资料是不可能做到的。书成之后,长辛店的工友们非常高兴。大家都希望这部作品能够拍成电影。当时周扬同志、陈荒煤同志也很重视。但终因故未能拍成,大家至今仍认为是憾事。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为了采访工人运动的先驱者邓中夏的事迹,结识了他的夫人夏明同志。邓中夏是最先在长辛店工人中搞启蒙活动的重要人物,又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我们在《红色的风暴》中已经初步写了这位青年革命家的英雄形象。夏明同志积累了许多有关邓中夏的材料,她最大的心事就是希望有人能把邓中夏的传记写出来。这时候,她就这件任务付托给我们了,为这件事她还向中宣部写了一封信。尽管这时我久经准备的长篇小说《东方》急欲开笔,也只好应允。从此,我们又以这位杰出的工人领袖为中心,踏上了一个长长的行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列主义怎么同工人阶级相结合?工人在哪里?找什么样的工人?怎样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对于北大学子的邓中夏和其他先行者,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为了找工人,他们曾经先去洋车夫中活动,费了不少力气认识了一些拉洋车的工人,一次,在天安门前用洋车摆了一个方阵,准备开会,结果没有开成,就被马队冲散了。后来他们又去寻找北大印刷厂的工人,也因工头的干预没有成功。最后他们才到了长辛店,以开

办劳动补习学校作为工运的起点。这些具体生动的过程，过去学党史没有学过，自然使我们深感兴趣。

1961年5月，我们与夏明同志结伴南下，在武汉、南京、上海、长沙、广州、南昌、南宁等地进行访问。在各地党政机关的协助下，访问了众多的老同志、老工人。前后达一百余人。其中有郭沫若、茅盾、李立三、陶铸、陈郁、史良、朱务善、杨东莼、陈望道、李达、包惠僧、冀朝鼎、潘梓年、陈同生、马非伯、郑绍文、马乃松以及苏兆征的夫人等多人。这次历时半年的访问，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其中尤以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工人运动，给我们的印象最为深刻。那时有不少参加五卅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的工人还健在，如上海的江元清、刘桂宝，广州的罗珠、彭松喜等同志，都给我们谈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情节。这次大访问本身，可以说是一次党史的学习、工人运动史的学习，也是对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品格和特质的学习。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历次的大搏斗来看，使我深刻地认识到，比起其它阶级来，她确实是一个最坚决、最英勇、最少顾虑、最少负担、最富牺牲精神的阶级。她的组织性、纪律性也最强。她在革命运动中显示的作用和威力也最大。试想二七大罢工，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使几千里的平汉铁路陷于瘫痪；在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中，二十五万以上的香港工人齐刷刷回到广州，使香港变成臭港，而且竟坚持十六个月之久。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说明，唯有工人阶级才有资格作革命的领导阶级，也唯有工人阶级才能决定中国的未来。不论是搞革命或者是搞建设，都必须信任工人阶级，依靠工人阶级。当然工人阶级也必须重视工农联盟和与其它革命阶级的联盟。

《邓中夏传》于1964年完成初稿。此后为“文革”所中断。

1981年5月，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粉碎“四人帮”后，我去看望彭真同志。他亲切地说：“你接触过工人吗？你还要多到他们中间去生活。”我回答说，我曾在二七厂机车车间当过一段副支部书记，他欣慰地笑了。

我对二七厂这段生活，自己也很满意。主要是对工人阶级有了更深的理解，并且交了许多朋友。可惜这段生活并不算很长。

我离开二七厂，小惠同志继续留在那里。后来他当了二七厂的副厂长，真是在工人中彻底地扎了根，落了户。遇到工人中有趣的人物和有趣的事情，他就同我谈一谈。而且他依然是那么勤勉，把这些材料都认真地记下来。我就向他建议，是否写一些工厂人物的素描。我还找了一本高尔基的《俄罗斯人剪影》为他作参考。因为我深知，创造文学典型，那是谈何容易的事！如果不从对真人的研究上下工夫，那可能会变成一句空话。相反，如果对生活中的真人研究得很认真，很有成效，想象的翅膀就会飞翔起来。创造文学典型的任务就有可能完成了。小惠欣然同意。最近两年，他就把二七厂印象深刻的人物一一地写了出来。这就是这本集子的由来。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我大部分都看了，其中描写的人物，有不少是我们俩共同熟悉，或者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我看着那些人物活生生的性格和生动的细节，常常不自禁地微笑起来。这些文章，大部分在二七厂的小报上发表过，很受工人同志的欢迎。这些作品最可贵的是真实，是那些胡编乱造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近年来，写工人的作品愈来愈少，尤其以工人为主人公的作品更为罕见。仿佛工人阶级已不再是这个时代的主人公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全国各地都培养了一批工人出身的作家，

其中有一些为全国所知名，写出了不少反映工人生活的优秀作品，江苏的沈虎根同志就是这样的作家。去年我见到他时，曾问讯到其他工人作家的情况，他说有一些还在坚持，另有一些则改了行，“下海”去了。我听了之后，感到不胜惋惜。小惠同志的素描集在此时出现，我想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

1995年2月7日

目 录

序.....	魏 巍(1)
赤子之心.....	(1)
独臂厂长	(28)
王大罗嗦	(61)
赵忙人	(66)
铁面人	(70)
康大炮	(80)
苗大吹	(85)
刺儿刘	(89)
红管家	(94)
好老头	(99)
革新迷.....	(107)
“杂牌军司令”.....	(110)
抢修.....	(117)
同时时间赛跑的人.....	(120)
精神不老的陈发.....	(124)
锤上春秋.....	(127)
毫不利己的人.....	(130)
千里兰州访故友.....	(133)
不平凡的友谊.....	(139)
《北方的红星》演出盛况追记.....	(144)
换了人间.....	(148)
耕耘小记.....	(154)

赤子之心

厂长的经

俗话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黄英夫——别看他是万人大厂的厂长，衣冠楚楚，相貌堂堂。大权在手，一呼百应。开大会时，站在台上器宇轩昂，仪态潇洒，说话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真是八面威风，神气十足。可正像《红楼梦》里王熙凤说的：“大有大的难处”，他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哩！

就说厂里的机构吧，近万人的老厂，十几个科室，二十来个车间，常常是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下边怨言一大堆，说什么领导偏这个，向那个。这个是亲娘养的，那个是后娘养的。什么时候机构臃肿了，市委领导一声令下，马上拆“庙”搬“神”，合并科室，撤销车间。可用不了半年，铁道部、市里各局要求什么会都要一把手参加。强调业务对口，下边必须有“腿”，天长日久，机构渐渐扩大，牌子、办公桌又越来越多，于是，市里又……真是应了我们老祖宗的一句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回的“折饼”。再说，上面“衙门”多了，上边千条线，下边一针穿。上边一个部门布置一项任务，下边就成了招架不开的“总统”。

厂大不说，特别是修理这碗饭不好吃。车型复杂，德、美、日、法、比、英……各国的车都有，简直可以开个“万国展览会”。进来的车破损不一，修程不定，没法提前统一准备，只能“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工作往往是“临时抱佛脚”、“眉毛、胡子一把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一到月底，就发愁完不成任务。成年累月，手忙脚乱，没完没了。

大厂，走到哪儿都是机器，不少是老掉牙的皮带床子，“老牛破车”。人多手杂，不定多会儿出个机械事故、人身事故，或闹一场火灾，叫人天天提心吊胆，睡觉都不踏实。

身处首都，得天独厚，是“天子脚下的工厂”，加上有光荣的“二七”革命传统，报上常常露脸。“树大招风”，采访的，参观的，蹲点的，来往的人踢破了门槛。

地方上，治安、卫生、支农、教育、绿化……什么都得管，都得操心，哪一炷香也得烧到，哪一方也不敢怠慢。工厂干部不能一门心思抓生产，一天到晚忙碌碌，乱糟糟，闹哄哄。

生产上，铁道部驻厂验收室、工厂检查科，像两个威严的门神，为了向国家、人民、工厂负责，对产品质量一丝不苟，把得严而又严。“财神爷”手里拿着铁算盘，让你不敢越雷池一步。声望显赫的厂长，只有批 24 平方米建筑或 300 块钱的权，就像忍气吞声的“小媳妇”。

条条多，框框多，头绪多，麻烦多，一点考虑不到，捅了漏子，就得吃家伙。

常言道：“火车在铁轨上还有掉道的时候”，谁敢保证工作一点不出错？出了错，就得挨批，记过，通报。

譬如 1955 年，铁道部一声令下，把全路职工的年底双薪取消了。厂里职工，特别是解放前进厂的老工人意见纷纷，说

这是过去工人经过斗争得来的福利，不应该取消。这事惊动了市委，市委书记把他和党委书记找去足足批了一通，说：“执行铁道部的命令是对的，可是这么大事，为什么事先不向市委报告！？不向市委请示！？还有没有组织观念？有没有党性！”他们只得硬着头皮，老老实实，一声不吭地听着……

为此，尽管他过去在石家庄、天津、南口厂工作过，多次获得铁道部颁发的流动大红旗，可说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来这儿，又使这个解放前一个月只能修几台机车，几十辆客车、货车的老厂，现在达到每月修二三十台机车，二百多辆客、货车，每台机车在厂周期由三四十天压缩到平均十一二天，任务完成得不错。可有谁知道这里边经历了多少酸、甜、苦、辣，付出了多少汗水、心血、代价？没日没夜的劳累，没完没了的扯皮，矛盾、关键、难题……就像魔鬼一样老是缠着你。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累得连骨头架子都差点散了。

一位新上任的厂长，千里迢迢，前来请教当厂长的经验。他想了想，苦笑着摇摇头：“要说经验，谈不上。要说体会，倒有这么几句，就是要有钢般的头皮，铁般的脸皮，不怕挨打的屁股！”

快 人 妙 语

他的思维敏捷，见解独到，说出的话极为幽默、风趣。

工作中，干部意见发生分歧，不能一致。他总是风趣地说：“咱们都姓共，受共产党领导，没什么不能说到一块的。”人们听了也就一笑了之。

毛主席在全国享有崇高的声誉。每当电台广播、报纸刊登毛主席的指示，他总是诙谐地说：“天老爷说话了！”

工厂领导在工作中，为了说明情况，常要列举一些数字。这些数字不仅种类多，而且有的每月或每年都得变。作为一个厂级领导，脑子里要经常清楚地记住这些数字，的确很不容易。为此，他深有体会地说：“在厂里，必须了解、掌握一些主要数字。行政工作，就是在数字里头打游击。”

工厂就是战场，生产活动千变万化。他虽在人民大学喝过几天墨水，但终究是半路出家，短短几年中，尝够了当厂长的五味俱全的滋味。为此，当有位实习厂长问他：“我上任要作点什么准备呢？”他风趣地说：“你先练好胆，不要去炼丹。把胆练大了，然后再作好两手准备，一是干砸了——进法院。一是累趴下——进医院……。你就照我说的往前迈吧！”

身为一厂之长，他十分懂得和重视工会的作用。一次，副厂长向守富去市里交涉一项生产任务，他坚持要厂工会主席张廷瑶陪同一起去。他大声、风趣地说：“老张后边有群众。老向，你后边有什么？只有沙发！”

1958年大跃进，工厂结束了半个多世纪只能修理蒸汽机车的历史，造出了我国第一台六百马力的内燃机车，全厂职工精神振奋，意气风发。他在大会上兴高采烈地说：“我们造了一台内燃机车，好比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又白又胖，别看个头小，劲儿不小，人人都挺喜欢。就是有一点不好，爱尿尿（漏油）。不过，别着急，这也好办，有病可以交给‘他妈’——送回二七厂修。”人们听了大笑。

一天，他给全厂职工作报告，谈到产品质量，说：“最近，机车场旋了四个汽缸，都有砂眼。翻砂场的同志听着，你们都——是——砂——眼，哈哈！”

1965年，在动员调整工资的会上，他对全体职工说：“现

在，家里的劳动生产率，比厂里高得多。咱们别生那么多孩子，好不好？有两个‘备品’就行了！”

最后，提到近来收到的群众来信增多，说：“这两天，我家做饭的成了收发的了！”

一次，去人事科，见一踢球好手向科里要求调回厂。他插嘴说：“你回去向领导坚决要求，我们要。”接着放低声，“可别说我挖墙脚啊！”

见到检查科长李清福老不刮脸，胡子拉碴的，开玩笑说：“再不刮，我要拿锄头来锄了！”后来，见他穿一身新做的中式黑棉袄，笑道：“这身衣服，是准备穿着去见马克思的！”

一天，他和大伙搭卡车去市里开会。上车后，对外号“大象”的车间主任说：“你站当中保险。要站旁边，大轴就发热了！”

形容一个老职工心脏不好，说：“他内部的发动机有毛病了。”

经营副厂长孙运来去治病，他劝道：“你上次是‘中修’，这次不如索性‘大修’，把‘内火箱’也换一换。”并提到自己“身体也不好，肺部有‘砂眼’，部件也坏了。”

武装部一个复员军人，过去在部队里当侦察员。他说是“刺刀尖上跳舞的人物”。

一位厂长多年从事地方工作，做事文质彬彬，慢条斯理。他开玩笑说：“幸亏早年你没在部队，不然，早做敌人俘虏了！”

他常和干部、工人下象棋。一回，对方不知怎么将“相”走了“马”步。他笑着说：“相改行了！”

在给铁道部副部长的信中，一次，他写着：“我登记挂号的时间不算短了，可能排队的人太多，需要先处理急诊，……您

叮咛我要注意生活，意思不让我闷吃傻睡，养成一个不费脑筋的大肚皮，我照办了，现在壮多了。今天趁空去看您，本想请您检阅检阅我的身体状况，不巧，您又开会……”

他就是这样风趣！

作为一厂之长，紧张的生活节奏，使他养成了行动快的习惯。别看他个儿不高，步子不大，走起路来，谁也追不上他。假日，他和大伙逛商场，别人刚进去，他却已匆匆看过出门了。爱人赵宗英要他慢点，他说：“我已捺了性子，要不还快哩！”由于走路老像打冲锋，脚上皮鞋可倒了霉，前部磨得特薄，总是先从头上坏。

他肩上压的担子重，思想不能不全集中在工作上。

晚上，厂里有事，他顾不上和家里打招呼。有时弄到半夜回来，饿极了，到厨房里到处翻箱倒柜找吃的，惹得爱人直笑。

去市里开会，也从想不起通知家里，常常让家人吃饭白等。给他提意见，也总忘到脑后。

由于个人的事，脑子里总排不上号，生活中，闹了不少的笑话。

他常吸烟，但老忘带火柴。一到开会，就在衣服、裤子兜里到处乱摸。最后，两手空空，只得厚着脸皮向人要。

一次，去铁道部开会。走到门口，一摸上衣口袋，糟糕！工作证没带，才想起换衣忘取出了。忙回到车边，向司机借，免了进门的麻烦。

一天，他坐上一辆三轮，走不多远，忽然一个劲摆手，说：“下来，不坐了，不坐了！”车夫站住，奇怪地问：“刚上车，怎么不坐了？”他哭笑不得地说：“没，没带钱……”车夫也乐了。

还有一回，他在前门饭馆吃饭，放下筷子，一摸口袋，傻眼